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九)

引文格式: 杨新莹. 实践逻辑与超越向度: 从《哥达纲领批判》中分配正义理论到彰显共同富裕的基本分配制度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 (2): 39-49.

实践逻辑与超越向度: 从《哥达纲领批判》中 分配正义理论到彰显共同富裕的 基本分配制度

杨新莹

摘 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的基本分配制度, 是对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 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从《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铁的工资规律”的反对到我国分配制度中劳动的合正义性前提, 从马克思阐述的按劳分配的相对正义性到我国创新的按贡献分配, 从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分配正义到我国基本分配制度兼容并蓄各派分配理论合理因素, 从马克思否定“把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分配给社会一切成员”到我国实现了新时代的分配公平, 从马克思勾画的科学社会主义分配正义蓝图到我国国家治理中的共建共治共享, 我国基本分配制度在多维度上继承和超越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中阐述的分配正义理论, 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 即具有共同富裕属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并指导我国的分配实践。

关键词:《哥达纲领批判》; 分配正义; 共同富裕; 基本分配制度

作者简介: 杨新莹, 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高等教育慈善文化传承与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研究”(23JJ0406)。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2.0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立场是人民性。《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 蕴含了马克思关于分配正义的诸多观点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宏伟构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用了很大篇幅揭批了拉萨尔主义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错误认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分配客体、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割裂的所谓“公平的”分配, 阐述了其建立在唯物史观上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蓝图的设想也蕴含了对分配正义的理解。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以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方式非正义性为逻辑起点,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眼光洞见分配中的正义问题, 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采取增进人民幸福的分配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的基本分配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彰显新时代共同富裕特征的新表达。

一、从反对“铁的工资规律”到劳动合正义性的逻辑起点

(一) 马克思反对“铁的工资规律”，主张无产阶级可以改变命运

按照拉萨尔的经济观点，存在一个“铁的工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平均工资始终和一国人民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的习惯有关。工资水平提高了，就会导致工人婚育需求增长，而人口增加又会拉低工资水平；反之亦然。拉萨尔派的分配观点是建立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基础上的，完全否认了资本家的雇佣劳动榨取工人剩余价值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按照拉萨尔派的见解，工人阶级贫困是人口增长不均衡造成的，即人口增速超过生活资料增速就理应贫困，进而推论出这种贫困是工人阶级自身造成的，不是非正义的。这和马尔萨斯主义认为“过多穷人争夺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斗争使得他们因为饥饿和疾病死亡”的观点一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种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拉萨尔主义将工人阶级的贫困看作“铁的”自然规律，认为工人阶级人口繁殖速度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宿命论思想。

马克思两项伟大的贡献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学说无论哪一个都从根本上驳斥了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就唯物史观角度而言，工人贫困不应是“宿命”的，劳动者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就剩余价值学说角度而言，工人贫困更不是什么“铁的”规律，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的劳动异化，即劳动力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商品，造成的。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铁的工资规律”说，指出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不仅捍卫了剩余价值学说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阐明了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是可以通过阶级斗争和劳动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的学说闪耀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分配正义的光辉。

(二) 劳动的合正义性基础是我国基本分配制度彰显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

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认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创造美好生活的正义观，同时还将劳动的合正义性基础融入分配正义的意涵中。概括起来就是，在劳动前提及劳动本身正义的条件下，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分配方式才是正义的，这符合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唯物史观视角，在分配正义中彰显了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

劳动的合正义性包含“劳动的前提应当是正义的”与“劳动本身应当是正义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1]。“劳动的前提应当是正义的”是指获取生产资料的前提是正义的，与之相对的是，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家掌控前提下的雇佣劳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生产资料由劳动者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劳动者在法律法规制度的保障下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获取生产资料的前提是正义的，因而劳动是合正义性的，这是彰显共同富裕的基本分配制度得以实现的生产关系前提。而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生产关系恰恰背离了这一点，导致了“见物不见人”的劳动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前提是广大劳动者被迫屈从于基于生产资料少数人所有的雇佣劳动，这个前提是非正义的。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2]。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本质是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践踏和折磨，是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严重割裂的，这种非正义的行为必将被历史车轮所碾压。“劳动本身应

当是正义的”主要是指劳动应当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合乎新时代的价值和精神，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劳动不是为了追求分配价值而进行的危害自然、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不和谐的行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明确指出了“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这是彰显共同富裕的基本分配制度得以实现的伦理前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7}是“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特征。“劳动合正义性”的两层含义符合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蕴含的唯物史观和人民性的价值精髓，也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我国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一“劳动正义性前提”基础上，贯彻新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环境治理制度，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制定环保督察制度，修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治理理念，确保发展不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依法打击非法收入等，确保发展不以侵害社会和其他人利益为代价。我们通过上述具体举措实现“劳动本身正义”，以确保劳动行为的合正义性逻辑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劳动者通过劳动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共同富裕。

二、从相对正义的按劳分配到通往共同富裕的三次分配

（一）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非绝对公平却相对正义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十一章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剥削实质和历史规定性，认为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即资本的存在本身就暗含了这样的分配关系——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而资本家对土地拥有排他的所有权，因此“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分成三部分参与分配，即劳动力所有者、资本所有者以及地产所有者分别分得工资、利润和地租^[4]。劳动者虽然创造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自己却只能分配到得以维持基本生活和保持生存来继续被资本家剥削的那极小部分工资。《哥达纲领批判》主张通过分配使劳动者获取财富进而消费财富的解决方案，其基本内容便是不劳不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就是按劳分配。

虽然马克思支持以按劳分配代替资本主义的剥削分配，但他也认为按劳分配不是绝对公平的，“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的^{[5]15}。虽然按劳分配并非绝对公平，但相较于资本主义“三部分分配”也不失为一种相对正义的分配制度。马克思始终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按劳分配，在分配方式中坚持唯物史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道，“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5]15}，它默认了劳动者在天赋、体能、教育程度、家庭状况等方面的差别。尽管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和拉萨尔派分配正义理论，但仍客观地指出了按劳分配也存在不公平性，这个观点后来被罗尔斯借鉴到正义论的“应得”概念之中。罗尔斯“没有人应得自身的能力、天赋，继而由此应得更多的分配利益”的观点是对近100年前马克思“平等中的不平等性”观点的认同，这也从历史的视角彰显了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跨越时代的真理性魅力。鉴于同质的才能加以比较的规律，权利也要用同一尺度来衡量。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按劳分配这种分配制度以劳动作为同一介质尺度，打破了阶级之间的界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被限制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架之中，但是相较于其他分配制度更为接近正义尺度，是对劳动人民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也客观地认识到“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6]。

(二) 按贡献分配是按劳分配在新时代共同富裕语境下的新模式

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3]13}。基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保分配中的正义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可行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等三次分配理论话语。

我国基本分配制度不被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单一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所局限,在一次分配后还存在二、三次分配,这就克服了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指出的按劳分配在遇到劳动者天赋、体能、教育程度、家庭状况等个体差异情况时不可避免存在的弊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对分配方式的重大探索,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极大的开创性。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这种分配方式称为按贡献分配^[7]。这里的“贡献”内涵丰富,不仅包括劳动的贡献还包括生产要素的贡献,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所有制决定了分配方式。我国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决定了在收入分配领域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而不能仅仅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这就必然要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存在。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内容、形式在不断拓展,贡献程度在不断提升。

中国共产党对按要素分配的认知深化发展是有着明确的发展进路的。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7]的基本分配制度,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7]。2021年12月1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推进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知识、数据等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体系。”^[8]这里可以看出,“劳动力”本身也被归于生产要素。按生产要素分配,一方面可以看作按劳分配的发展,知识、技术、管理本身也是劳动凝结,是固化的劳动;另一方面可以看作按土地和资本分配。我国在允许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同时,也提出要给资本设立“红绿灯”^[9]。

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分配(也包含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一部分)对应马克思社会发展蓝图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阶段,而超越按劳分配的按需分配对应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5]16}。现在实行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按贡献分配方式是为实现共同富裕,走向共产主义这一高级社会形态,最终超越按劳分配,实现人类终极分配正义打下基础,它既不违背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原则性,又兼顾了中国实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应坚守的原则和立场并兼顾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

三、从唯物史观视角审视“反动的一帮”到包容兼收各派分配理论的合理因素

(一)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审视分配正义问题

何为分配正义,何以实现分配正义,这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关注的问题。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拉萨尔派的分配主张其实质是逃避国家职能、国家阶级属性和所有制而孤立地去谈分配正义的形而上学正义论；反对拉萨尔派不讨论或者回避土地、工具、生产资料而空谈“不折不扣劳动所得”分配，认为正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劳动力成为商品导致了人的异化，抨击拉萨尔派“工人阶级”之外的“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5]17}的武断论断。马克思认为，反动不反动要放在人类历史发展及其所处的阶级和时代中说，比如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主和中间阶级来说就是革命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是反动的，这和讨论何谓分配正义道理是一样的。

人类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关于分配正义的探讨，其中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包括以下四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美德分配”，实质是按权力分配。“分配正义”最初来自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分配正义就是位高权重的“美德多”的人应该多分^{[10]2}，侧重的是美德的赏罚而不是需要，且区分了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他的观点后来被阿奎那所接受。

第二种观点认为分配正义排斥穷人可以公平参与分配，实质是按财富分配。在1750年以前的西方社会，多数哲学家认为穷人的贫困是有自身原因的，或是罪恶，或是不礼貌，或是不道德^{[10]12}，因而根本不可能考虑照顾穷人的分配正义问题。这种观点甚至在100多年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身上还在“发扬光大”。斯宾塞“自然惩罚论”的正义观为资产阶级财富正义辩护的属性至今还会招致多重批评^[11]。格劳秀斯引入了“属性正义”和“附加正义”学说，认为人在生存急迫状态下占有他人的食物或者药品不属于不正义，但必须严格限制，并认为富人帮助穷人是“爱的法则”，而不是道德义务^{[10]29}。休谟认为，富人在道德上有义务施舍穷人，但是不履行这项义务也不构成非正义^{[10]45}。上述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自由主义哲学家诺齐克，他的“持有正义”说认为，应该追求个体的分配而不必考虑他人、群体利益，国家和社会不应在分配中抹平个体本身的差异^{[10]161}。哈耶克反对国家福利泛化的新自由主义分配说实质上也是承袭了上述主张。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人应当平等参与必需品的分配，偏重于设置一个社会分配底线并强化公平的分配方式。早在东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时期，查士丁尼大帝编纂的《民法大全》里就有记载，“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东西”，“这是一种坚定而永恒的愿望”^{[10]7}。洛克把劳动纳入了可以参与分配的一种美德。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分配思想的代表，他认为，关乎生命、自由、财产、名誉、身体完整等是“完美权利”，必须强制保障实施，必需品权利应该人人享有，包括穷人，但应该严格限制^{[10]36}；“尽管一些人付出劳动更多反而更穷”看似不平等，但只要他们在不平等制度下比在财富平均分配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就应该接受这种不平等^{[10]56}。亚当·斯密以此为资产阶级财产权和理性辩护，他关注穷人的尊严和素质提升，并从财富转移、税收以及公共物品倾斜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分配正义问题的解决方案^{[10]87}。卢梭认为，巨大的贫富差异造成公民之间的仇恨，应该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并重新考虑财产分配问题以达到社会公平^{[10]83-85}。康德认为，应该区分保护性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其中分配正义应由法律规制，即，对穷人的救济理应有国家管理，以确保每个人都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10]95}。巴贝夫支持严格的人人平等享有美好生活权利的分配正义，具有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蕴，只是这种平等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平均主义^[12]。

第四种观点倾向于功利主义，实质是考虑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分配方式。如果说前三种分配正义观点和宗教色彩分不开的话，18世纪以后的分配正义观点则从宗教中剥离开来，更多地从政治权利或者经济权利来探讨分配正义问题，带有功利主义倾向。穆勒的分配正义观力论政府救济穷人以达到社会最优的功利主义分配正义^{[11]142-147}。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在功利主义底层逻辑基础上提出的福利经济分配学说，力求平衡公平与效率^[13]。如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

家理论分配学说促进了战后经济的发展。边沁从边际效应的角度考量财富在富人或者穷人之间分配哪个可以带来更大的幸福的问题^[14]。罗尔斯认同马克思的人来源于社会的观点,认为应当抛开亚里士多德式的德行分配探讨,从需求角度探讨“帕累托最优”分配“基本物品”的正义问题^{[10]152-153}。这些学说,本质上都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探讨分配方式。

人类历史上这些分配正义主张和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不同的是,没有一个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以解决广大劳动者或底层大众的贫困为初心为目的的。究问上述“分配正义”理论的出发点,或者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或者是维护富人的财富地位,或者是减少财产产生的罪恶,或者是为资本主义统治辩护。马克思分配学说与上述所谓的分配正义学说迥异的是,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动态地、历史地、现实地审视分配正义问题。马克思认为,应该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对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决定作用的角度去考量分配正义,从生产关系是否与生产力相契合的角度去审视分配正义。“一定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15]马克思认为,正义必然会体现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分配方式之中,也只有这样的分配方式才是符合人类解放的、正义的分配方式。马克思通过人类历史发展的“长镜头”来考量诸如分配正义等观念问题的主张,即使是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这样的当今研究政治哲学的国外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认同。弗莱施哈克尔在《分配正义简史》中提道:“我们这些同情自由派观点的人也能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那就是,观点不仅仅是有史以来所有理性的和不带偏见的人看待世界的天生方式,而且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10]137}这充分说明了弗莱施哈克尔对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待分配正义问题的认同。

(二) 新时代迈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分配制度吸收了各派的分配正义理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分配正义理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前述各派分配正义理论虽然都存在其局限性,但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的合理性成分,而这些合理性成分正是我们要借鉴的。前述分配正义理论不外乎两种模式——倾向尊重同一性模式和倾向尊重差异性模式。持平等的自由主义观点的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学说认为,天赋、资质这种先天差异不是应有的,其导致的分配差异是偶然且不平等的;与罗尔斯同一阵营的以德沃金、阿内森、舍夫勒为代表的“运气均等主义”理念支持者认为,仅靠运气而非后天的努力造成的分配差别是不可取的,政府应当减少这种分配差别,从起点上促进分配公平^[16]。在这一派的观点中,总能看到《哥达纲领批判》中“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的观点。而诺齐克、哈耶克等人的分配正义观点恰恰是以尊重差异性为前提的。《哥达纲领批判》发表近100年后的罗尔斯的回归假定的“平等主义”的设想虽说不切合实际的,但其所倡导的靠契约程序建立分配正义机制的程序正义论在某些思路上和我国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用制度保障共同富裕不谋而合。

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考量分配正义问题,应当坚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视角,批判地吸收前述各派分配正义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以完善我国治理现代化中分配方式和分配制度设计问题。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包含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重视发挥三次分配作用”^[7]等多层次的内涵,是在遵循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基础上,融合前述各派分配正义理论中的合理主张而做出的分配制度安排。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做到了既在初次分配中体现按劳分配这一差异性原则,鼓励按照创造价值个体差异分配财富,又在二次、三次分配中保留了同一性原则,避免过大的个体收入差距,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都得以满足,是完美地结合了同一性模式和差异性模式的分配模式。在设计惠及十四亿人的分配制度时,孤立适用同一性原则或者孤立适用差异性原则都不适合发展实际,融合两派

优势才能解决好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国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这就需要全体劳动者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撸起袖子加油干，而这一点也必须体现在分配方式上。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不落一村一户一人的现代化，这就要通过分配方式保护困难群体的利益，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彰显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优越性。

差异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界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规则的体现，但是生态正义并不完全适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要更多地考虑资源获取和食物链层级，其实物分配是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而人类的分配是同类之间的调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是“类本质”的，因此不能摒弃主观能动性和伦理性而单纯地考量竞争，人类的发展不能简单地看作与自然界进化、物种选择没有差别。事实上，“基于这两重生命本质诉求，两种正义原则也必然是从交互竞替到协同并存。差异性和同一性是相互对立统一的”^[17]。因此，必须考虑社会中暂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困难人群的权利问题，要将同一性原则所遵从的公平性和差异性原则所遵从的个体性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既保障了多劳多得又坚守了共同富裕底线，消除了西方分配正义理论中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矛盾与冲突，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迈向共同富裕的分配正义理论在真理性和价值性上的辩证统一。

四、从否定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到实现新时代分配公平

（一）马克思否定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分配给“社会一切成员”

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拉萨尔派把目光仅聚焦于分配关系而置生产关系于不顾，妄图在不铲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个“历史祸害”的前提下就将劳动所得“不折不扣”地分给“社会一切成员”，这是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割裂开来的分配正义观，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了《德国工人党纲领》中的上述主张，将其称为“庸俗社会主义”。首先，“劳动所得”是为了打破当时被誉为“国民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而造出来的一个并未言说清晰的概念，“劳动所得”是产品本身、是总价值还是价值增值都语焉不详。其次，“社会一切成员”是否包括不劳动的成员，如果包括又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标准、何种范围将其纳入分配，是平均分配还是照顾弱势群体抑或是其他，也并未涉及。最后，“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将“全社会劳动所得”进行“不折不扣”的分配，即便是为了社会稳定发展也是要有扣除的。

至于如何扣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建构了“社会总产品”的概念来阐述。他认为，可以作为分配客体的，都应当从全社会劳动所得这个社会总产品中扣除，包括“用来补偿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才可以作为消费资料。但在对消费资料进行分配之前，还应当扣除社会“管理费用”、社会“共同需要”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经过上述两轮扣除后的剩余社会总产品，才可以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在刨去各种扣除后每个生产者领回来的就是他贡献给社会的^{[5]13}。这种分配实际上从理论上杜绝了“不参与劳动的人参与分配”的不劳而获，是以社会发展、社会成员共同发展和弱势群体发展为观照的分配。关于劳动者在共享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按劳分配并照顾弱势群体的分配理念，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中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这种观点融合了前述各派分配正义理论中同一性与差异性的主张，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基础。

(二)“三次分配”制度是以共同富裕为目的而对“社会总产品”理论的继承和超越

马克思认为,在达到共产主义之前的过渡阶段,按劳分配虽不十全十美,但是符合分配正义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维度^[7]。其中,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是对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继承,是“守正”;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是“创新”。在探讨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时,我们不能拿100多年后的今天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理想分配方式和马克思当时所描述设想的通往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简单地做教条化的对比,而应该从科学性、发展性、实践性和现实性的角度去考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并解释为一种不依赖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5]17}。我们要在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点和精髓的基础上,基于具体的生产方式和具体的发展阶段去考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问题。

社会公平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的社会总产品“扣除理论”^{[5]13-14}也是为了保证照顾社会“共同需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进而实现公平。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公平应当包括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四重意蕴,“三次分配”的制度设计安排就是为了在实现上述四重“公平”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首先,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倡导人民可以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反对贫困“铁律”说。我国的初次分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劳多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收入”^[7],这就提高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能够直观地通过分配显现出来,进而感受到劳动的获得感,这是最符合市场效率原则的。劳动者是在为国家、社会劳动,同时也为自身劳动。公平的初次分配实现了通过劳动改变自身命运、创造美好生活、走向富裕的积极价值传递,是符合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中人民性的价值取向的,也确保了劳动者在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同时能够实现个人在分配领域的机会公平。

其次,按照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按劳分配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默认了人的禀赋等差别,因而初次分配不能解决起点公平问题。不同劳动者的体力、能力、家庭背景等差异注定了存在劳动起点不公平。按劳分配主要解决的是共同富裕中的“富裕”问题,鼓励劳动者劳动致富。但对于因体力、能力、家庭等差异难以通过按劳分配实现富裕的人而言,就有必要进行二次、三次分配来确保公平,来解决初次分配“富裕”后的“共同”的问题。尽管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水平,但为了增进人民福祉,二次分配突破了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主要表现形式是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这实际上是按需分配的体现,是和马克思构建的科学社会主义分配蓝图相契合的。贫富差距和共同富裕是对立的。我国基本分配制度中的二次分配有助于消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符合公平原则和共同富裕旨向,也继承了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中“社会总产品扣除理论”。在进行消费资料分配之前,前置性地扣除保险、社会运转资金和弱势群体保障资金用于二次分配,这也确保了分配中的结果公平。

最后,我国基本分配制度还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第三次分配是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未曾涉及的分配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对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时代超越。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愿参与的、以利益为基础的资源流动分配机制,纯粹的道德追求与获得实在利益是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基本的行为动机^[18]。在我国,第三次分配方式表现为慈善捐赠或者志愿服务。慈善捐赠侧重于捐赠财物这种物质贡献,而志愿服务侧重于时间、精力无偿付出这

种精神贡献。无论是慈善捐赠还是志愿服务，第三次分配都彰显了社会成员的奉献精神和“利他”诉求，践行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是朝着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的分配方式，是直接指向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第三次分配是对马克思人学理论关于“人的解放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按劳分配正义理论的超越。第三次分配主要用于对年老、年幼、患病、失能等弱势群体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促进了分配公平中的结果公平。第三次分配已经显现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的初影，是极具前瞻性的分配方式。从实践上看，从成功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到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从积极参与海外援助到针对普通百姓的社区居住地帮扶，都有来自中国公民的慈善捐赠或志愿服务。

纵观我国的三次分配制度，初次和二次分配显现了国家治理中的法治，三次分配显现了国家治理中的德治与自治，法治、德治和自治在三种分配方式中的有机结合深度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分配领域中的正义性，深度彰显了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中的唯物史观和人民性的立场，深度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写满答案的教科书，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永不穷竭的真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是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分配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人民幸福、人民共享和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分配领域的集中体现。

五、从“每个人”与“一切人”分配正义蓝图到国家治理中的共建共治共享

（一）马克思勾勒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的愿景蓝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9]的论断，不仅阐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形态是“真正共同体”的理论旨归，而且清晰地剖析了分配正义的三个核心要素，即“谁参与分配”、“谁主导分配”和“分配的目的”，因此，可以将《共产党宣言》的上述阐述看作分配正义理论的奠基之论。“每个人”和“一切人”回答了“谁参与分配”，“联合体”回答了“谁主导分配”，“自由发展”回答了“分配的目的”，这种分配正义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说：“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20]他认为，正义的分配一定是能够增进人民幸福的分配，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了无限制地创造财富的分配，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分配理论上的表现。

（二）“三共”治理制度是分配正义理论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体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部分明确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简称“三共”）治理制度是分配正义理论融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中“谁参与分配”问题的新时代回答，是解决分配公平中的过程公平问题以迈向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是以对“分配权”进行监督实现分配正义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创新。

政府在初次和二次分配中都扮演着重要主导者的角色，在三次分配中也发挥一定的作用。尽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纵观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因公权力滥用产生的分配不公的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老百姓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

分配中的腐败直接削弱我国的制度优势,弱化我国的治理效能,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

我们不妨用边沁的“分饼理论”来看这个问题。如果社会可供分配的资源是一张饼,如何才能避免分饼的人利用规则而多拿?最好的办法是设定一个分饼规则——让切饼的人后拿,而让不切饼的人先拿。用这个理论来解读社会治理中的分配问题,就是引入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来参与“切饼”,建立和完善人民参与的“三共”体系,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以此来确保公权力在主导分配时能够实现分配正义。

以共同富裕为视角看待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三共”的社会治理制度,不仅体现在社会宏观分配正义层面,而且体现在探寻分配行为中每个主体也就是制度的具体制定者、执行者以及潜在接受者的诉求层面。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是包含了全民性和全面性的内涵的。我们这里可以参考持“方法论个人主义”(而非“政治个人主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乔恩·埃尔斯特特的局部正义论观点,从注重考察机构或个人的行为的偶然性和复杂性的角度出发,研究“机构在如何分配社会稀缺物品问题”时形成的“三级半行为”的局部正义解释框架,即一级行为人为稀缺物品的供应者或政治权力掌握者、二级行为人为执行具体分配决策的社会机构、三级决策者为希望得到稀缺物品的申请者或潜在接受者、最后半级决策者为监督分配正义与否的公共舆论。按照这种观点,不同层级的分配行为人的初始动机是不同的,比如一级行为人更为关注整体社会的公平以及在公平基础上形成的整体社会效率,二级行为人更为关注局部的效率和局部平等,三级行为人更为关注私利而非公平效率,而在当今媒介融合大趋势下半级行为人公共舆论也容易被引导和操控。在国家治理中强化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既可以在一、二级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将决策权力和执行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减少腐败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又可以让三级以及最后半级行为人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充分主张权利,因此“三共”治理模式是平衡“三级半行为”不同动机和诉求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道:“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这些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扶贫等具体方面的民生改善,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在新时代面向共同富裕的具体化表达,继承了马克思“社会总产品”理论,从具体领域、具体制度上解决了面向共同富裕的分配公平问题。“三共”治理制度,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解决民生问题的中国方案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上的体现,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面向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

参考文献:

- [1] 贺汉魂. 马克思增进人民幸福的财富分配正义思想 [J]. 伦理学研究, 2019 (3): 16-23.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53.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647-649.
- [5]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21.
- [7]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19-11-06 (1).
- [8]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政府监管效能 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N]. 人民日报, 2021-12-18 (1).

- [9]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N]. 人民日报, 2022-05-16 (1).
- [10] 弗莱施哈克尔. 分配正义简史 [M]. 吴万伟,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11] 张蒙蒙, 张建国. 批评、合理性与理解: 斯宾塞自然惩罚论的再审视 [J].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2, 42 (6): 38-49.
- [12] 岑燕坤. 巴贝夫平等思想探析 [J]. 社会主义研究, 1996 (2): 46-49.
- [13] 赵艳艳. 庇古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及价值研究 [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9: 19.
- [14] 何子英. 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理论到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理论: 杰索普论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出路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6 (6): 20-27.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5 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997-999.
- [16] 熊义刚, 周林刚. 分配正义理论的两种辩护路径比较研究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45 (6): 53-62.
- [17] 易小明. 分配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3): 4-21.
- [18] 曹振. 共同富裕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运行逻辑与制度展开 [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3 (6): 32-43.
- [19]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20]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23.

Practical Logic and Transcendental Dimensions: From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to a Basic Distribution System of Manifesting Common Prosperity

Yang Xinying

Abstract: The basic distribution system, which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r as the primary mode while accommodating various distribution methods, and constructs a coordinated system of initial 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ertiary distribution”, represents both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Marx’s theor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t embodies a Chinese version of Marx’s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ory in the era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showcasing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rom Marx’s critique of the “iron law of wages” in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to the premise of labor justice in China’s distribution system, from Marx’s exposition of the relative justic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r to China’s innovation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contribution, from Marx’s examina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China’s basic distribution system incorporating rational elements from various distribution theories, from Marx’s rejection of “distributing the full proceeds of labor to all members of society” to China’s realization of fair distribu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Marx’s delineation of the blueprin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under scientific socialism to the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in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China’s basic distribution system inherits and surpasses Marx’s theor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lassic works such as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forming a Chinese version of Marx’s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ory in the era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t is a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of distribution with the attribute of common prosperity, re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era China and guiding China’s distribution practices.

Keywords: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distributive justice; common prosperity; basic distribution system

(收稿日期: 2023-10-04; 责任编辑: 沈秀)